

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0-47

2010年10月29日

想念父親

北京大學 孔慶東

仿佛意識到是在夢裡，父親發來了電子郵件，讓我給他保存一份什麼檔案。

我想可能是做夢，搞錯了吧？就去查是不是父親來信了。哦，果然猜對了，父親寄來了一些發黃發紫的他的個人檔案，要我好好保存。

我想父親真夠相信我的，這般重要的東西，怎麼就放心讓郵局給遞送呢？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。於是便到廚房，對正在做飯的母親說，您回哈爾濱看看我爸去吧，他一個人，又那麼大歲數了，生活很不方便哪。

母親說，我才不回去呢，那老東西，脾氣那麼倔，什麼都跟我擰著來。他不就樂意一個人麼？我不回去，我在你這兒多好啊。

我說，回去看看吧，他都80多歲了吧。

母親說，可不是嘛，他死的那年70，今年可不80多了嘛。

啊？父親死了嗎？我冷不丁渾身一驚。只見滿頭白髮的父親，笑容滿面地看著我們。

是的，父親早已死去十多年了。那麼我現在，這還是在做夢呀。父親死的時候，哪裡有什麼電子郵件，哪裡有什麼網絡，連我都不知道什麼叫電子信箱呢。

這回夢醒了，但是睜不開眼睛，因為眼睛裡早已充盈了淚水。

我半夢半醒地掀開被子，呆呆地坐起來，聽見外面刷刷的雨聲。撩起垂簾不捲的窗帷，已經是暮色沉沉。東京秋天的暮雨，下得正急。

這幾天工作非常累，每天只睡五個小時。今天下課回來，便想小睡一會兒，晚上好繼續工作。明天報名了一個旅遊團去看紅葉，放鬆放鬆疲憊的身心。

然而這個夢，再次提醒我，該寫那篇文章了吧？該寫下那四個無數次湧上心頭的字了吧：想念父親。

是的，這個題目，我多少次在心裡唸叨著。在路上，在車裡，在烈日下，在風雨中。但是總不知道如何下筆，有時都快要寫了，隨即便陷入了那個“想念”裡去，寫文章變成了回憶往事的檢票口。日語把“檢票口”叫做“改札口”，那意思很有趣，頗像我們寫文章，持著一個“札”進去之後，“札”的性質就“改”了。今天這一回，我估計八成還是開了個頭，終於什麼也寫不成的。

父親叫孔憲之，曾名孔憲知，生於 1925 年，屬牛，屬得其所，一輩子是個牛脾氣。他有個姐姐，就是我的姑母孔憲秀，比他大四歲，88 歲才去世，我身在日本，不能前往，可能這也是我夢見父親的一個徵兆吧。

天下孔姓分 60 支，我屬於最正宗的“聖人支聖人戶”。我的 58 代祖是衍聖公，名叫孔公鑒。我就是孔公鑒三弟孔公鏗這一支的孔子第 73 代後人。我的祖父孔昭禮，是家族裡的長子，下面有

三個弟弟。大概各家的事務都歸他總理吧，我的祖父就被稱為“甩手掌櫃的”。根據父親和堂叔們的談論，我判斷祖父的生活水準，起碼是個富農。因為家裡有車馬，有買賣，還有雇工。祖父不用親自勞動，兜裡經常有零花錢給侄子們。整個家族裡都很尊重他的威嚴，即使晚年，祖父到哈爾濱住在我們家的那幾年，堂叔們仍然對他畢恭畢敬。

可是我家祖孫三代填表的時候，出身欄卻一向填的是“貧農”。當年父親在淮海戰場上入黨，組織上問他家裡是什麼成分，父親搞不清楚那個成分的“標準”，說是地主富農似乎不好，要說是貧下中農吧，又覺得有點丟臉。把家裡說得越窮越好，窮得連耗子都餓死了，那是文革時的極左毛病；把家裡吹得越富越好，富得耗子都跟姨太太睡在一張席夢思上，那是野蠻發展觀時代的極右毛病。父親拿不準家裡的階級成分，就摸著石頭過河說：“是中農”。

不過這個成分可不是自己說了算的，組織上是要寫信調查或者派人外調的。那個外調的同志到我們山東老家一看，我祖父光棍一個，出無車，食無魚，地不過兩畝，房只有一間，院裡不見雞鴨犬，牆上掛滿地瓜乾。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：“老孔，你家算什麼中農啊？你家也配中農？你家比我家差多了。改過來，貧農！”就這樣，我家的成分被“改札”為貧農了。

父親每次講到這一段，有些慚愧，又帶著點得意。那慚愧是緣於被人家揭穿了虛榮心，“明明家裡窮，裝什麼中產階級啊”！而那得意，則是因為此後在現實生活中，得到了實惠。貧下中農成分為主的工人階級，實際上構成了毛澤東時代的“中國中產階級”，他們政治上受尊重，生活上很安逸，大鍋飯，鐵飯碗，衣食住行無憂，生老病死有靠。所以，艱苦奮鬥建設新中國家底的也是這批人，逐漸喪失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和警惕性，養育了新生資產階級的也是這批人。

父親出身貧農，又是山東老八路，三野的解放軍，後來是工人老大哥，再加上有文化，那種政治上的自豪簡直是牛氣衝天。但就是這種自豪，使得他不求上進，貪圖安逸，在吃吃喝喝與罵罵咧咧中享受完了他的後半生。從大多數人的角度看，這是極大的遺憾。但我想從他自己的角度看，也未必不是一種幸福。革命勝利了，老子就要享受它幾十年的革命勝利果實，父親不正是用自己的後半生實踐了這一理論嗎？儘管他所享受的，不過是普通的酒肉和普通的閑適。但是一個基層的工人，能夠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，幾十年沉浸在這種生活裡，強大的國家，平等的社會，穩定的收入，純樸的人情，你就不能不承認，那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、平民百姓的幸福時代。

可是我一直有個疑問，祖父的那些車馬、那些買賣，都弄到哪兒去了？怎麼偏巧在解放前夕，他成了一個貧農呢？1970年代我第一次回山東老家，鄉親們衣食無憂，精神面貌也愉快樂觀，但是村子裡還沒普遍通電，多數人都不穿內褲，平時也很少吃肉，看得出大家都是窮人出身。只有我祖父，吃穿都講究，出入有威儀，咳嗽一下都帶著金玉之聲，上廁所繫腰帶都是舞臺動作。他在哈爾濱我們家裡，整天眯著眼睛，拿著一柄小木梳，梳理他那部花白的長鬚。梳好了，睜開一對忽然間變得很大的眼睛，就去下館子。我父親幾次跟他吵架，都是因為發現他自己吃獨食，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。我怎麼看我爺爺，都不像是個“貧下中農”啊。

後來把我們家族的材料聯成一片，慢慢想明白了。祖父兄弟四個，還有遠遠近近堂兄弟一群，本來都歸他管。可是後來分了支，特別是其中很多家“闖了關東”。在黑龍江的富錦縣，盤踞著我們家相當大的勢力。大人們說到“富錦”，就像說家裡的一個買賣似的，他們會說“我到富錦住幾天”，“到富錦那邊要點錢”什麼的。在哈爾濱和鶴崗，也有零星的幾家親戚。不論誰家，都似乎跟

我祖父發生過金錢方面的來往。而且我的祖母很年輕就去世了，父親又當兵在外，祖父對侄子們是比對我父親更加疼愛的。到底是他自己有意散了財，還是大家一起“幫助”他散了財，都無所謂了。反正解放後，我祖父也一直過得很幸福。他是一個有威嚴、會享受的“貧下中農”，女婿是棗莊煤礦的礦長，兒子是老八路，每月給他寄十塊錢，晚年還到哈爾濱這麼洋氣的大城市住了幾年。因為害怕火葬，又回到山東。去世之後，子孫千里奔喪，披麻戴孝，完全按照封建禮教將他土葬入殮，可以說是一生無悔啊。

我祖父喜歡新社會，說新社會“喜氣”，但也偶爾懷念舊社會。他經常聽了什麼廣播後，操著一口蒼老的魯南話，深深感嘆說：“毛主席，了不起啊！”但偶爾又加上一句：“就是火葬這個事兒，瞎胡鬧——中央有奸臣哪！”每次中央或者黑龍江什麼路線鬥爭勝利了，打倒了某個政治人物，或者會議代表的排名發生了變化，爺爺都很高興地要喝酒，以為跟他作對的那個奸臣被揪出來了，火葬很快就要取消了。可是過了一段，仍然不見動靜。爺爺就瞪著父親說：“這個奸臣，還是木（沒）揪出來呀！”父親雖然也一腦袋封建思想，但在火葬這個問題上，還是受黨教育多年，能夠堅持唯物主義立場的。他煩躁地對爺爺說：“你就是迷信！土葬火葬不都一樣嘛？人關鍵是活著的時候，多吃點肉，多喝點酒，死啦就死啦，土葬你也木（沒）什麼吃，火葬你也木（沒）什麼吃呀！”爺爺一拍桌子：“畜牲！”

他們父子倆很少能聊到一塊兒，因為立場相距甚大但脾氣卻同樣暴躁也。後來爺爺對我母親流淚說：“東兒他媽，我不能在哈拉濱老啊，我要是在哈拉濱老，那個畜牲就把我燒成灰兒，冒青煙兒啦。我還是回關裡家老吧。”爺爺告別了老劉家和其他鄰居們，帶著他的私房錢和我母親又塞給他的幾十塊錢，回關裡了。關於祖父年輕時候的事情，我就一點也不知道了。

我祖母去世的時候，我父親才四歲，所以他從小缺乏母愛。缺乏母愛的典型表現是，平時好像很暴躁，但對人間柔情特別敏感，看了忠臣孝子啊、扶老攜幼啊、生離死別啊之類的好人善事就容易落淚。落淚有損英雄形象，於是就儘量迴避人間柔情，裝出野蠻粗魯的樣子，對什麼都大咧咧地吆喝一番。看電視如果遇到柔情蜜意的場面，馬上就換頻道，嘴裡嘟囔著：“媽了巴子，演得什麼玩意兒！”其實心裡是很想看下去的。我估計他一個人在家的時候，肯定會看那些感情戲，很可能還會咧著嘴嗚嗚地哭。但我們一出現，他立馬就裝成個老虎。

父親填表“文化程度”一欄，寫的是“初中”，其實他唸的是私塾。他看不起現代教育，但知道“初中”比“私塾”好聽。他自幼學的是三百千和四書五經，留給我的最珍貴的遺物，就是一冊《朱子格言》和幾冊四書。父親認識很多生僻字，比如茶、豸、弁、井，拿根棍子往地上一寫，全樓都不認識，於是個個敬佩：“人家老八路，就是有文化呀！”父親很得意，經常翻著本《四角號碼字典》查來查去。我上小學前就會查四角號碼了，“一橫二豎三點捺，四叉五插方塊六，七角八八九小小，橫上一點是零頭”。用四角號碼查字，不但使我能夠迅速記住字的結構，而且使我對漢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後來上了北大中文系，見古典文獻專業的基本功裡，有一項就是查各種工具書，聽到幾個同學唸唸有詞地背著：“一橫二豎三點捺”，我覺得十分好笑。現代教育看做很高級的東西，其實人在童年就可以掌握，誰說教育是越來越“進步”呢？後來再聽他們背“一橫二豎三點捺”，我就接著搗亂說：“四關五馬六張飛。”

認字讀書的功夫，我很快就超過了父母，但寫字卻是我的軟肋。小時候是“大劃拉”，現在是“劃拉大”。我父母的字在一般人裡，算是寫得很好的。母親的字比較秀麗，帶點小資氣息；父親

寫毛筆字起家，後來改用鋼筆，所以他的字工整規矩，藏鋒轉筆都一絲不苟，如同部隊出操。父親經常罵青年人的字“寫得跟狗爬似的”，這個我沒法反駁。但是有一次他罵罵咧咧了一陣，見我不理他，忽然放低了聲音說：“你那個字兒寫得亂七八糟，將來你批文件兒，讓下級笑話。”我由此知道，老頭子原來有“望子成龍”的思想，希望他的兒子當官呢。我雖然頗有看不起老頭子之處，但對他一生抗上，從不溜鬚拍馬，是暗自敬佩的。也許我早就萌生了這樣的潛意識，我要本事比你強十倍，還要比你能抗更大的官。你不過罵的是幾個廠長局長，我將來要罵的官，比他們大百倍！

父親說話直截了當，並非是他牛脾氣天性一味粗魯。一個原因是我祖母早逝，我祖父又不怎麼照看他，自由散漫慣了；另一個原因是多年的部隊生活，縱容了他的炮筒子性格。抗戰時期，山東是形勢最複雜、鬥爭最殘酷的地區。村上經常過隊伍，很多青年跟著走了。有的跟著國軍，有的跟著偽軍，有的跟著土匪，父親不知是覺悟高還是運氣好，跟上了八路軍。可是八路軍也很封建，一聽他姓孔，不敢要他。因為山東老家一直信奉著“好鐵不打釘，好人不當兵”，孔子後代不論富人窮人，都是儘量一不做官、二不經商、三不當兵的。近代以來傳統社會解體，人民生活日窘，漸漸地孔姓之人也難守此訓，做官經商者日多，但當兵還是一條大忌，往往要下大決心，或者改姓，或者更名的。

我父親堅持要“參加革命”，並亮出了自己的硬件——私塾出身，相當於初中文化。八路一聽，被雷住了，因為他們指導員才小學畢業。於是從不敢要，到幾支隊伍搶著要，最後費縣縣大隊用一顆美國花瓣手雷收買了我父親，給他們當了文書。我問父親那顆手雷呢？炸死鬼子了嗎？父親說太漂亮了，全縣就那麼一顆，是劉少奇送的，捨不得扔，後來讓一個女八路給偷去了。我想也許不是偷去的吧，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呢！

父親講過很多他們打鬼子反掃蕩的故事，但我覺得都沒有電影上演的好看——兒子永遠覺得媒體比爸爸強。特別是父親居然沒有跟鬼子拼過刺刀，真沒勁。多年以後方知，父親講的，才是真實的戰爭。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圍了，抄起槍和手榴彈，嗷嗷叫著一邊亂打一邊就往外衝，等天亮一看，有光著腳的，有光著腚的，有嘴裡叼著鬼子耳朵的，有手裡拿著鬼子腸子的。我小時候覺得，爸爸這夥八路軍，這仗怎麼打得這麼醜陋？這麼噁心？一點英雄氣概都沒有，跟電影上的李向陽、趙勇剛他們比，簡直是一群土鱉。可父親老是愛講這些，還說什麼拼刺刀是拼不過鬼子的，如果沒子彈了，就抓一把土往他們臉上揚，然後撲上去就咬。我心想這都是什麼損招啊？電影上的八路都是一個人挑翻七八個鬼子，怎麼到我爸他們這兒，改成流氓打群架了？

今天再想父親所講的場面，乃深深體會到那是何等的驚心動魄。每一秒鐘，我的父親都可能沒有了。把那個場面千百倍放大，每一秒鐘，我們中華民族都可能沒有了。

講到解放戰爭，仗打得就輕鬆多了。父親最叫苦的就是走路，一黑夜要走一百多里山路，走著吃，走著睡，走著撒尿。漣水戰役華野失利，父親他們被一路從蘇北追到魯南，國軍離共軍的尾巴只有五分鐘的路程。有的戰士跑到路邊拉泡屎，就被俘虜了。父親不愛看《南征北戰》，說：“媽拉個巴子，一點不真實！”在我們看來，那已經是最真實的戰爭片了，裡面共軍死了很多人，國軍很威風，而且是解放軍真槍實彈演的，裡面的影星仲星火還差點被打死。父親叨叨說：“我的這個氣管炎，就是南征北戰，讓國民黨攆出來的，他怎麼不給演？陳老總說了，不會跑路能打勝仗嗎？他光演打勝仗，我遭的這個罪為什麼不演演？”但是講到孟良崗戰役全殲 74 師，父親總是眉飛色舞：“奶奶的，這下可報了仇了，讓你攆！三

萬多王八犢子，連張靈甫，帶攤煎餅的，一個沒跑了，全他媽收拾了！”

山東戰場的幾個戰役之外，父親主要參加了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。淮海戰役中，父親一個人押運二百副擔架過黃河，沒損失一個傷員，立了三等功。我小時候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，跟董存瑞比差多了。多年後我有一個機會，護送 12 副擔架去醫院，剛過馬路就丟了兩副，到醫院一數，還剩七副擔架五個傷員。想想父親當時上有敵機下有敵兵，民工都是烏合之衆，而且傷員都脾氣暴躁，神智不清，圓滿完成任務確實不易。父親說很多傷員疼痛難忍，就打護士，護士因為沒有麻藥，就流著眼淚任傷員打。這時候父親大喝一聲：“媽拉個巴子！你是國民黨啊？國民黨才打人啊！”這句話往往比麻藥還管用，可見“國民黨”一詞當時已經臭到了什麼地步。

父親還抓過一批俘虜，我跟很多人講過。有個電影裡演過類似的情節，不知道編劇是不是輾轉聽到了我說的故事。一天夜裡父親他們排睡在墳地裡，天濛濛亮時對面的哥們過來借火抽煙，火柴一亮，彼此發現是敵人，父親他們手疾眼快，先端起了槍，結果俘虜了一個連的國軍。父親的立功表上有一項四等功，我估計可能是這件事。

後來的渡江戰役就沒什麼可講的了。父親說國民黨真不禁打，他媽的成群結隊主動來投降，你想立功都沒機會了。另外把我們的豬肉白麵都吃了，那時的規矩是，反革命吃豬肉，新革命吃豆腐，老革命吃白菜。王八犢子們一傳十、十傳百，都投降過來吃豬肉，他媽的反革命反成祖宗了！我們這些老革命，端著白菜窩頭在旁邊看著，乾生氣木（沒）辦法。還有林彪的四野、劉伯承的二野，也都渡了江，都趕來會大餐，其實湊什麼熱鬧，陳老總一個人就夠了。

父親不懂全局的形勢（其實讀讀毛選就明白的），也似乎不知

道三野的很多戰事都是粟裕大將指揮的，他就對陳老總一個人愚忠，很少提到粟裕等其他將領，可見當時陳毅的個人魅力也是我們研究軍史時不該忽略的。渡江後父親不在先頭部隊，就一路跟著“撿洋落”。父親領著一群山東哥們，胳膊窩裡都夾塊木板，上寫某某縣人民政府，等部隊把那個縣一佔領，某位哥們就去掛牌辦公了。所謂山東幹部遍天下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
父親到了蘇州，就止步了。他講到蘇州，一個是大米真難吃，一個是大姑娘真難看。第一條我和我媽都贊同，因為糧店裡賣的南方大米，東北人都不愛吃，寧肯吃粗糧，也覺得比那“秈米”香。第二條我不大相信，人們都說蘇杭出美女，俺爹咋說不好看呢？母親說父親是土包子沒見過世面，他心裡就知道那些“山東大妮子”。後來我想人在戰爭年代的審美觀可能具有獨特性，比如林彪就認為錦州出美女，此乃互古未有之論。人家毛主席明明說了：“錦西那個地方出蘋果。”他林彪非說出美女，就因為錦州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戰場。俺爹說蘇州大姑娘難看，到底是在蘇州遭受了什麼挫折，影響了他對蘇州婦女的觀瞻，還是正話反說，本意是蘇州大姑娘真好看呢？他在蘇滬一帶停留了好幾年，但是具體做什麼工作卻語焉不詳，只說過康生到蘇州，他參與過警衛佈置，每條胡同一挺機槍。我到蘇州住在觀前街時，晚上出去在胡同裡溜達，想像著當年父親也在這些石板上走過吧。

1953年，父親被調到東北，準備赴朝參戰。但還沒過鴨綠江，停戰協議就簽字了。父親吹牛說美國鬼子要是再不簽字認輸，等我過了江，哼，三八線就劃到媽拉巴子美國了。父親以為三八線就是用“三八大蓋”步槍劃出來的一條分界線而已。他很愛看抗美援朝的電影，可能是因為自己不曾參加，看著過過癮。

然後是大裁軍，父親轉業到鶴崗（他們山東人唸“豪崗”），後到哈爾濱，當了個小廠長。他1950年代的歷史我很不清楚，看

他履歷表上沒犯過任何錯誤，但官卻越當越小，這一點不像陳老總，倒是像賀老總。到我出生時，他只在豆腐廠當了個車間主任，雖然說相當於分廠長，但職權是很有限的，也就能決定把豆腐渣賣給哪家養豬的，所賣的錢還不能私吞，而是全體工人一起喝酒用了。

從我小時候的角度來看，父親生活的最主要內容就是喝酒、聊天、罵領導、打兒子。他對待鄰居同事都超級友善，別的孩子欺負我，他總是先揍我一頓，再去給人家道歉。外面遇到的任何人，他都能拉到我家來喝酒，不管家裡有沒有菜。他所罵的領導也到我家來喝酒，但他還是照罵。動不動就說：“老子是抗日幹部，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打天下，你們他媽的坐享其成，走後門，不要臉，都是修正主義王八蛋！”其實他不懂什麼是修正主義，他罵人家的所謂走後門，不過是送孩子參個軍或者一斤肉票買二斤肉之類。他就這樣慢慢得罪了很多“當權派”，文革時被人家批鬥了多次。所以他1970年代以後，經常罵文革，他認為的“文革”，只是1966、1967、1968這三年。他把很多看不慣的事，都歸罪到文革頭上。比如我一頂撞他，他就說文革教壞了你們這些王八羔子，一點不孝順！我心想那你頂撞我爺爺，是誰教壞的呀？他還不喜歡簡化字，說文革把字都簡化了，他還得重新適應，寫出來一點沒文化。但他寫自己的名字時，從來不寫那個“憲”的繁體；寫我的名字時，也不寫那個“慶”的繁體。他不知道簡化字古已有之，民國時期就曾經公佈過，新中國頒佈簡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。他還看不慣青年男女手拉手“壓馬路”，說媽拉巴子文革把你們都解放成流氓了，大白天就手拉手，這不是國民黨嗎？其實哈爾濱風俗歐化，男女交際相對開放，文革前後基本沒什麼變化的。

文革後期，各城市都組織了工人民兵，相當於武警，人家就把他調去當了個分部的副總指揮，實際意圖是省得聽他罵人。他幹得挺得意，弄了支卡賓槍放在家裡，還偷了幾粒子彈。說當年有支三

八大蓋就不錯了，第一次看見卡賓槍還是陳老總的警衛員身上揹的。過春節的時候，趁著滿城鞭炮震天，他讓我衝天打了一槍，笑著說：“看你那個熊樣，當兵不行啊，當個司令還行。”

他管民兵期間，是有點實權的，抓捕過不少著名流氓大盜。那些人沒有一個恨他，更沒有人在我身上報復。因為抓到之後，他總是去親自審訊，把人家臭罵一頓，講一番社會主義紅色江山來之不易和你媽生你多麼不易的大道理，最後問人家，你對得起毛主席、對得起陳老總嗎？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說對不起。他就讓人家寫檢討書，按了手印，然後就放了。其中有幾個還真的改邪歸正了，父母拎著雞到我家感謝。父親說這不算走後門，把雞收下吃了。

文革過後工人民兵解散，他回到豆腐廠，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。副主任他不願意當，工人他當不了（因為不會做豆腐），歲數也大了，就當了打更的。人家更夫都是天一黑關門睡覺，他卻認真得很，兜裡裝根麻繩，夜裡起來巡邏多次。他很會抓小偷，雖然上了年紀，身體又很胖，卻能三下兩下把一個小夥子捆得結結實實。他曾經酒後把我一隻胳膊綁在桌子腿上，我用另一隻手怎麼解也解不開。他幾次要教我這種綁人的功夫，但我出於逆反心理，沒學。

父親抓到小偷，還是喜歡給人家訓話，然而這已經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小偷了，不管黑貓白貓，偷到葷腥就是好貓，誰還聽他那套叨叨令？他最生氣的，是有一次那小偷居然還反過來訓他：“我說大叔，你讓誰給忽悠啦？你還真把這工廠當成你自個的啦？你還以為這是毛主席的年頭啊？我把話放到這兒，用不著我偷，這工廠出不了十年，肯定有個大號的賊，整個浪地、一根毛都不剩地，把它偷嘍。你愛信不信！說句實惠的，大叔，趁著現在都蝦蟆哈吃眼的，你也趕緊往家劃拉點，將來人家一動手啊，你想吃屁都趕不上熱乎的啦。”父親聽了大怒，給了那小偷倆嘴巴。我沒在現場，但我估計那小偷看俺爹的神情，大概跟魯迅《藥》裡夏瑜看紅眼睛阿義差

不多吧。

或許是打小偷的報應，父親最心愛的東西被偷走了。1990年代初，他兜裡揣著他的轉業證，他的軍功章，還有一枚淮海戰役紀念章和一枚渡江戰役紀念章，去老幹部局上訪，結果在公交車上，連同錢包一起都丟了。他寫信告訴了我，我感覺到他的心在流血。我不能怪他粗心大意，我願意用在北大剛得的一千元頭等獎學金，買回那些金色的檔案，雙手呈放到父親的面前。但父親也知道這只是幻想，他之所以告訴我，是他知道，這世上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有多痛。

父親此後變得更懶了。我家住在五層，馬路對面是哈工大巍峨的克里姆林宮風格的主樓，我們窗下是川流不息的車輛和熙熙攘攘的市場。父親退休後，經常痴痴地遙望窗外。哈爾濱的豆腐衰落了，哈爾濱的紡織衰落了，哈爾濱的軍工衰落了。坦克廠生產的拖拉機，競爭不過鄉鎮企業；導彈廠生產的麻將，競爭不過郊區的農民；飛機廠生產的自行車，連成本都收不回來……我料他定是想起了那小偷的預言。父親是個平民，也甘當平民，但他是見過世面的胸懷天下大事的平民。外人只見他喝酒罵人吹牛，不知道他幾十年讀書讀報，感情有很細膩的一面。他年青時玩過攝影，玩過集郵，玩過鐘錶。他喜歡史地知識，經常拿著放大鏡研究地圖，他知道所有的省會和全國的鐵路幹線，能背出幾十個國家的首都。他高興時也能說幾段子曰詩云，還會點簡單的樂器。他並不贊成我選擇文學專業，也不懂“中文系”是幹什麼的，但我上北大後假期回家，他總是拿出厚厚的一本剪報，裡面是各種文學知識，還有連載小說。那些對我都沒有用，都屬於小兒科的東西，但我總是謝謝他。我們一家都是不喜歡輕易外露感情的，真心的感謝也往往故意用調侃化解掉。更何況脾氣都倔，都等著對方先低頭。

父親一生基本沒有對我說過軟話，但他的行動不自覺地透露出

很多掌心化雪的愛意。從學齡前一直到上大學，他都打過我，但我注意到，他從來不曾打過我的要害，有兩次把木棍打折了，都是因為我的肩膀太結實了。還有一次我凌空捏住了他打來的拳頭，霎時覺得自己的勁太大了，如果捏得他拳頭動不了，那是很讓他沒面子的，我就暗鬆了一點勁，讓他的拳頭還是打到我的肩窩。但他似乎覺察到了，垂下兩手，沮喪地轉身去了。他打我罵我，我都毫不屈服，但那一瞬間，我覺得自己很不孝，真想回到童年，毫不反抗地被他打哭，然後聽他醉醺醺地斥罵，反正罵完了就吃飯唄。

父親長期每月掙 48 塊錢，母親掙 38 塊錢。每月我們家給祖父寄十塊（祖父去世後，我妹妹出生，這十塊就用到妹妹身上），買商品糧油用去十多塊，每天給我二角錢大概一個月五塊，日常買菜等家用大約 15 塊，母親自己花用不到十塊，其餘 30 多塊，大部分都被父親用在了吃喝上。別人家如果有這 30 多塊富餘錢，日子是過得非常滋潤的，多數鄰居都有了“四大件”——自行車、收音機、手錶、縫紉機，個別的還有黑白電視機。而我們家自行車是公家的，收音機是朋友給攢的，手錶是 1970 年代才有的，縫紉機則一直沒有。全家存款最多的是我，因為我每天可以節省一角錢，每月賣廢品也可收入幾塊錢，還有過年時候的壓歲錢，這些錢主要用於買小人書、學習用品和鞭炮，其餘的則經常被父親連哄帶嚇“借”去喝酒吃肉了。

父親喜歡吃肉，而買生肉是要肉票的，所以他三天兩頭跟朋友下館子，多數是他付錢，還振振有詞曰：“我來，我來！我人口少，你嫂子從來不計較，家裡啥也不缺。有錢就他娘的花唄！”我和我媽對此很氣憤。但現在算算，他就是把 20 多年喝酒吃肉的錢都省下來，也就一萬元左右，現在也不夠他兒子在北京買一平方米的房子的，所以我現在寬容和理解了他的一切。我小時候雖然過得樸素點，但並未缺吃少穿。家裡每週都吃肉，經常可以買冰棍買水果，

過年總有新衣服，平時還有私房錢。半天上課，半天隨意遊玩，物質精神兩充實，確實是“陽光燦爛的日子”也。

假如我或者母親在街上撞見父親喝酒，他會叫上我們一起吃，趁機向我們灌輸他那套“人活著就要多吃多喝”的歪理邪說。這時候我覺得他的話雖然不對，但態度是很親切的。他打罵我主要都是我頂撞他或者不給他面子，其實他是非常以我為自豪的。每個學期的家長會，他都搶著去。我媽要去，他就反對說：“你懂個啥？你會說個啥？”我媽說：“大酒鬼，就你懂。”父親理了髮，抹點頭油，穿著他最好的衣服，威而不猛地坐在家長群裡，等著老師表揚他兒子。回來一邊喝酒一邊轉述：“今天三個老師一共表揚了你五次，媽的不要驕傲啊。”有幾次他還代表家長講話，在那種場合，他居然一句粗話也不說，講得簡潔有力，又能配合政治形勢，又能結合學校實際，確實有幾分陳老總的風度，往往掌聲如雷。所以他在家裡罵人時，母親會說：“你就欺負老婆孩子的章程！在學校講話，你咋不敢罵銀（人）呢？”

我單獨跟父親在一起時很少，時間長點的，一次是跟他“蹲牛棚”，一次是跟他回山東為祖父奔喪，這在多年前都有專門的文章回憶了。記得小學三年級，學校佈置了撿榆錢的任務，每人三兩，幹部半斤。父親十分罕見地帶我去逛了一天的動物園，一邊看動物，一邊撿榆錢。中午在草地上吃的麵包紅腸松花蛋，我喝的汽水，他喝的啤酒。我們爺倆沒有什麼話，坐在報紙上，各自想心事。我發現父親沉靜的時候，變得比平時更加寬闊魁偉，似乎身體裡有一片我所不知道的汪洋大海。吃完喝完，他一伸腿，就仰在草地上睡著了。輕風吹起報紙的一角，擦著他黑亮的皮鞋。陽光透過高高的樹梢，照在他國字型的臉上和大字型的身上。他開始打鼾，跟遠處傳來的老虎的低吼恰好一唱一和。動物園我經常去，但那一刻的動物園，我感覺就是天堂。

父親自稱三歲喝酒，但他喝了一輩子，卻沒喝過幾回名酒。我因為枉擔了一個“北大醉俠”的名，被文化部聘為“酒文化”顧問，每年都有人送我名酒。酒香滿室，此心悠悠。深夜小酌一杯，不禁想起父親。他若活著，看看兒子孫子，想必是很高興的。但看看世道滄桑，肯定又是生氣的。

我經常總結別人，但我總結不了父親。他的側面太多，似淺又深，似簡實繁，雖然不是聖人，卻真有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”的感覺。這篇文章就像開頭預料的那樣，一次是寫不完的。從東京寫回北京，寫回哈爾濱，寫到山東，寫到蘇州，寫到每一處我所知道的父親去過的地方。每一次打開文檔，都想起許多畫面，許多細節。寫了，又刪了。一會怕混亂，一會怕囉嗦，似乎從沒寫過這麼費事的文字。或許這不是一篇文章，而是一場對話，是一場彌撒，也是一首安魂曲吧。古人說的“子欲養而親不待，樹欲靜而風不止”，前一句是我的心情，後一句則是我的處境。

喝酒，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是父親的對手，但我想，這世上最能體會他心境的，還是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吧。父親一定有他的天下之憂和身世感懷，但他不是文人，他沒有寫出來，他對我講的都是“好的故事”和對我有用的事。他有許多秘密和想法都帶走了。我不想追尋那些秘密，我想我已經領悟了他的遺囑：不論世道如何，處境如何，都要堅持做正直的人、善良的人、能吃能喝的人、敢笑敢罵的人。人可以窮可以富，可以細可以粗，可以雅可以俗，但“士不可不弘毅”，總要對得起流金歲月，高天厚土。